

“诗界革命”与近代词的“在场”^{〔*〕}

——以文廷式词为中心的考察

○ 杨柏岭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从近代文学与近代精神之间关系的讨论出发,从尊重旧体诗词的抒情性角度,指出政治情怀是中国近代精神的文学抒写最具显示度的方式。文廷式在“写其胸臆”这个彰显近代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填词原则指导下,内敛民族情怀,表达维新派“变革图新”的政治见解;基于对帝后党争、君国分离这个晚清政局的亲身体验,抒写维新人士“君国一体”的政治理念,以及由身为逐臣到心为弃臣的政治心态的变化。由此,文廷式等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词家,正是通过词的诗化,拓展了词的境界,以在场的身份呼应了近代文学变革的要求。

〔关键词〕文廷式;诗界革命;在场;近代词;诗化

在中国近代词史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始终令研究者们困惑:一是中国近代时期是词的中兴还是衰落?说中兴,为何在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中未见如“词界革命”这样明确的呼声?说衰落,又如何解释这个时期极为丰硕的词学成果?二是近代词家的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有无呈现近代精神?说有,那如何看待词体抒情性与近代词的境界拓展的关系?说无,那如何认识近代词呈现时代精神的方式?一言以概之,近代词学有无呼应“诗界革命”的潮流,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些笔者在讨论梁启超词学时曾有涉及,^{〔1〕}这里结合文廷式词再做申说。

一、“革其精神”与近代词的境界拓展

多年来,因近代文学内涵、外延未能得到人们的共识,故而争论不休。概括

作者简介:杨柏岭(1968—),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学人思想、词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乾嘉以降词史演进的文化学考察”(12BZW055)。

而言,围绕近代文学与近代精神之间的关系,诸家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近代精神内涵有哪些?主张虚无论者,将此时期冠以清末或晚清之名,抹杀中国近代这一说法存在的必要性,由此也就取消了近代文学的学科意义;持冲突反应论者,将鸦片战争之后的思想意识乃至社会心理均纳入近代精神之中,混淆了这个过渡时期“旧学”与“新知”的复杂关系;持新旧对立论者,只盯着与中国古代不同的“西学”,而忽视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所带来的新变。笔者以为,中国近代精神是一种历史观,各阶段有着不同的要求,但总体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下,本着富强之谋、民族之立,既“放眼望世界”又期待“回到世界之中”的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这既包括西学的引入抑或是以西学为标准而获得的新认识,也包括本土文化以西学为参照的新变抑或是“自改革”部分。二是近代时期文学如何呈现近代精神?这其中主要有重形式与重内容之别,前者强调从新语句(“欧洲意境语句”等)、新语体(通俗化、口语化、白话文等)、新文体等层面寻觅文学上的近代精神,由此便自然对旧意境、旧风格的传统文体多持否定态度;后者淡化语词、语体、文体及风格,而强调从作品内容的精神层面考察,由此新旧文体均可纳入视野。其实,作为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其必然也必须带有过渡时期的特点,因为语言、语体等固有的稳定性,在考察近代文学的革新时,当以有无近代精神为准的,而不能仅根据新语词、甚至是现代白话文等要素,简单否定近代文学的革新精神。即使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这样语言运载工具上的大变化”角度出发,当探究中国那场划时代文学变革的更深远动因,均要追溯到近代文学上面来,这一切正体现了近代文学“作为新旧过渡、革故鼎新的‘桥梁’的价值”。^[2]

虽如此,人们在讨论以抒情见长的词体时,仍有一个心结未能解开。像王国维虽饱受西学浸染,其词论亦融会中西,但并未见他要革新词体的诉求。个中缘由,主要在于他在探本求源的治学思维下,视五代北宋词为有境界的典范,在梳理词史发展中,寻觅传统词学的特质,而非着眼于近代词学发展的历史。但问题是,部分学者以词的体性稳定性尤其是抒情性为据,提出词体不宜于革新的观点。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认为只有词体改变了传统的抒情性,方可称为革新。这种态度实则以显在的形式决定论、潜在的叙事文学及白话文标准,解读了词的境界开拓及其呈现近代精神的方式。其实,考察像诗词类文体的革新,除了语词、语体等形式变化,作品情思的实质内涵最为关键,这对检验处于过渡时代的近代文学而言,尤为重要。对此,较早予以揭示的正是提出诸多文学“革命”的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他先提出过“三长”(新意境、新语句、以古人风格入之)的标准,^[3]但后来认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反对“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主张“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若如此,“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4]

而稍长于梁启超的文廷式(1856-1904)关于词史发展,说过一个著名的论断:“词的境界,到清朝方始开拓。”^[5]文氏所言并非只是清代词家在词学传统中

的一种精进,而是蕴涵着一种以变革精神为导向的发展意识。他在《云起轩词自序》里明确说:“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在文氏这个意在自负的论述中,显然要求近代词家从“窘若囚拘”的传统词人群中跳出,而以一种改革者的新姿态出现。对此,他曾自言,“余于斯道……志之所在,不尚苟同”,故而论词史百家之利病得失,“亦非扞籥而谈”。既因非“肆力于词学”,又添之填词主“写其胸臆”,问学“务求心得”,使得他避免了“闻见道理”等惯性力量的牵扯,具有了呼应时代精神,开拓词境的可能。

百余年来,词学界十分重视文氏那卓犖不群的“兀傲”词风,但大多在强调他与清代诸词派异军对垒之后,又回到传统词学的惯性话语中评价他的个性与贡献。即便后来如施蛰存先生从“‘近代文学’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学”的标准,提出近代词“应当从文廷式开始”^[6]的观点,也很难让读者从当时“诗界革命”的话语背景下予以解读。因为文氏曾批评早期新学诗的创作风气,明言“正不必趋新派、作集字诗。新诗取悦一时,不久即当寂灭,终必以唐宋诸大家为归,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也”。^[7]于是,读者自然将文氏在诗词上的革新诉求,重新纳入传统的解说轨道上来。其实,文氏词学主张及创作所倾向的正是梁启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之意。文氏的词学主张与其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近代意识。他以“写其胸臆”为填词指导思想,在词史观上,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肯定了清代词家对词境的开拓;在词人修养论上,主张养胸中之性情,突出政治情怀,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及人格内涵;在词的接受上,主张读者“心通比兴”,在近代学人的古今中西学术视野下务求心得,关注词家的情志旨归。^[8]

而与其词学主张一致,文氏词的创作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亦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放眼看世界中,从传统类型中渐趋裂变,经历了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到心态文化的转变过程,他们在诗词中抒发的情思内涵也在变化。这其中,词家的政治情怀无疑是那个时代极具显示度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正如冒鹤亭所说,文氏“一身之进退,所系于世变者大也”,^[9]政治生活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其《纯常子枝语》、《罗霄山人醉语》、《琴风余谭》、《闻尘偶记》以及大量奏章中,便时见他的坎坷人生经历、丰富的政治阅历、深刻的时局思考以及觉醒的思想意识。进而在“写其胸臆”词学主张下,“身系政局”的文廷式填词亦多着眼于时势大事件,尤其注重通过对时事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党祸纷争的揭示,抒写自己的政治情怀。可以说,作为戊戌变法的中坚力量、帝党的核心成员等,能用语言坦诚地抒写自己的政治经历与态度,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学书写活动。这在近代词家中,正如钱仲联《纯常子枝语·序》所云:“晚清学者开派标宗者文芸阁、王半塘、朱古微,巍然鼎峙称巨匠,然以词人而为学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则独推芸阁。”^[10]因此,以文廷式为中心解析近代词呼应近代精神的方式,当是典型之例。

二、内敛民族情怀的“变革图新”的政治识见

如果说张惠言、龚自珍等“意内言外”词论源自传统词学的“自改革”；周济“感慨所寄，莫过盛衰”、谢章铤“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等词史理论来自传统的诗史观；邓廷桢以亲历亲为者反映“禁烟运动”的词作，虽“多涉政治、时事”，彰显民族情怀，却呈现为封建官吏的风雅气度……那么，被誉为“东洲先觉者”的文廷式于词中寄托的政治情怀，则是在静思中西文化优劣之后的一种祈求民族富强的政治家情思。这种民族情怀已不是那种“天朝上国”概念，因为他认识到，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积弊过深，“中国政非三代，教非孔子，特美其名而托言耳。实则秦法愚民，至今用之，锢蔽日深，苛刻日甚，与高丽、越南积习不甚相远，言之可为痛心”；^[11]“今则物力凋耗，强邻迫伺，而民无悛心，徒饰外以虚内”，^[12]内政不飭，外交丛脞，人事缠夹，世风愚昧，土风不古，那些衮衮诸公更“无所谓国是也，悠忽而已，因循而已”，“不耻于输情敌国，而意在防民；不恤于削地厚邻，而术在拒谏，举四万万之身家性命，置于若有若无之中，但图旦夕之酣睡”……一句话，“神州陆沉，正坐此矣”，^[13]清醒认识到“老大中国”正滑向“天道变衰”的险境。

叶恭绰曾说，文氏“深思卓见，恒虑清祚之不永，且时形诸笔墨”。^[14]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文氏革职离京，秋至长沙，作《风流子·江楼夜眺》词，下片在登高远望中以无端“沉忧”起笔，向当权者发出愤怒的质问：“哀鸿怨，举世有耳谁听？天际水何澹澹，山自青青？”社会民生，哀怨衰飒；自然山水，淡淡青青……此对照写法，本为中国诗文揭示社会变迁的传统写法，然此词作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词人笔下的“哀鸿”、“沉忧”以及对“沧海生桑”变化的预言，建立在“恒虑清祚之不永”之上，“举世有耳谁听”的发问带有为整个民族沉陷而悲愤的意味，彰显着这位“东洲先觉者”内心深处以政治家深思卓见自居的孤独意识。

这种觉醒的孤独与呐喊体现了近代新学派人士的普遍心声。于是，面对西方列强“分裂中国之说，二十年来，愈有形迹”，^[15]以及清廷顽固派对变革维新的无休止抵御的严重局势，文氏屡屡陈述其变革思想，所谓“古之所是，今以为非；今之所是，后亦或非之”，^[16]“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圣人不能为时，而必不失时也”^[17]……皆指出了不得不变革图新的迫切性。文氏曾在《繆小山前辈、张季直修撰、郑苏龛同年招饮吴园，别后却寄》诗之三自注云：“余最爱周止庵词《蝶恋花》。”究其原因，乃因周济《蝶恋花》（柳絮年年三月暮）“烟里黄沙遮不住，河流日夜东南注”句，借百川归海的自然之势，渲染了人心思变这大势所趋、无人能挽的时代气氛。

文氏既以思想家之识倡言变革思想，更以政治家之见提出了诸多变革措施。如《纯常子枝语》卷二说“欲振中国之人才，必自废科目始”，因为唐宋以来科目积弊太久，“其大患皆在诱天下以利禄，而束天下于一途”，致使“儒家一门独承

其弊，国家亦并受其弊”，所取之士多徒有空谈而无实学。与之前反思科目之弊者“皆思所以取而不思所以教”不同，文氏受到西方文明发展的启发，重在从如何“教士”上改造科目。教士不独只教儒学典籍，像农、工、商、兵、刑法等“凡生人所有用者亦并教之”，“如此行之，十年而大变，三十年以后人才足用，可以不受外侮矣”。文氏亦以言行践行这一信念，光绪十九年（1893）秋恩科，文氏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因“同考未荐”，致使“才气横逸，风期隽上”的故交王德楷落解，于是，文氏填《木兰花慢·寄上元王木斋》慰之，继上片叙说两人友情，因以志别之后，下片云：“男儿何不请长缨。挥剑刺龙庭。只麻衣入试，金门献赋，那算功名？藏形。不妨操畚，学兵符、须入华山深。四野荒鸡唱晓，万重飞雁回汀。”文氏自己走科举晋身之路，却劝慰友人以退隐之身务求实用之学，并非虚伪之言，因为这正源自他对传统科目取士之弊的认识，以及祈求国富民强而不受外侮的民族情感。

与主张废除不实用科目而不言废科举一样，文氏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之民心，亦不复如前之固执；广东孙文之事，所谓端之先见者”，但他并未走向革命灭清之路。因为“中国之分裂不分裂，不在君主、民主，而在政事之是非”，^[18]“今为中国计，惟君民共主，广用各国之人才，兼采各国之政术，举二千年来否隔之气而通之，晦昧之识而昭之”，若如此，走向文明强盛，便指日可待。^[19]如《清平乐》词云：

春人婀娜，春恨吟难妥。一缕醲香熏意可，独倚云屏闲坐。林间百种莺啼，玉阶撩乱花飞。生怕袜罗尘涴，黄昏深下犀帷。

叶恭绰曾据文氏长子永誉云，此阙作于“辛丑、壬寅（1901 - 1902）间”，“是时，密谋革命者已多，先生多与相识，而不欲参加，故云”。^[20]文氏以“春人”伤春为喻，诉说对时势的忧伤，以“一缕醲香熏意”喻指革命者的热情相邀，坦言在各种救世主张犹如百鸟啼、乱花飞的纷乱中，自己因生怕“袜罗尘涴”而走错方向，故只好洁身自爱，置身于革命之外，道出了其平生虽“激进”“兀傲”却不会叛清的政治立场。究其原因，这与文氏生长于仕宦之家的出身以及平生遭际密切相关。咸丰九年（1859）春，文氏祖父文晟及仆妇侍女、家丁等24人，即因迎战太平军遇难；同治元年（1862），文氏随父星瑞守定州城，多年后作《畅志诗十首》之一仍云：“微生多忧患，髫髻实初肇。透迤兵刃间，得活竟分秒。”且自注云“鼓角之声、仓皇之状犹在耳目”。可以说，文氏童年亲历太平军兵事的切肤之痛，已转化为其后来一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如江宁高德泰编有《瓮芳录》一卷（同治十三年刻本），记录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破金陵后之次年，其父高熊举义不受辱，领二子一妇三女孙投瓮中死之事。据《湘行日记》载，光绪十四年（1888），文氏于南京填《齐天乐·题高氏〈瓮芳录〉》词。此时距文氏祖父若干人等死难近30年、高氏家人殉节35年、清军克复金陵20余年。然词人落笔仍说“烽烟已静闻钟鼓，开编尚堪零涕”，全词在感慨自己与高氏“一样悲凉身世”中，以“大地平沉”说国势，以“长星昼出”说太平军，以“碧血谁收，千年魂魄化精

卫”状死难者,以“傅燮孤儿、阳源后裔”等节义事喻忠烈子嗣,歇拍“听彻荒鸡,揽衾中夜起”更以忠怀忧思作结,足见词人对太平军之恨之入骨,对死难者崇敬有加,对清廷独葆清节的政治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以政治情感为重心,融亲情、友情及“家国恨,古今情”的民族情感等于一体,浑瀚无迹而又情深郁勃,才是文氏词最具特色的情感世界。如其名作《蝶恋花》云:

九十韶光如梦里,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落日野田黄蝶起,古槐丛荻摇深翠。惆怅玉箫催别意,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

据《南旋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文氏应礼部试不第,四月二十八日(5月31日)出都,与挚友志锐等别离而作此阙,所抒之“情”依次有山河沦陷之感、朝考失利之痛、人间别离之苦(六妹及妹夫早逝)、国是日非之慨(中法战事历时一年以法国不胜而胜结束)等。其中,“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显然有所指。据《南旋日记》“朝考题亦太泄漏矣,题为徐用仪所拟,用仪非进士出身,而拟题亦向来所无也”的记载,文氏真正忧伤的不是朝考中的个人失利,而是朝考人事安排的制度以及国是日非的局势。因此,在表面上伤春悲秋、离别伤怀等传统情感形式中,始终内敛着一名政治家所体认的有关时局变化、中西对照、古今之变等中国近代社会心理。叶恭绰《广篋中词》(一)评此阙曰“沉痛”,可谓知言。由此,可以深入解读文氏通过深化情感内涵、扩大情感外延,而拓展词境的创作特点。

三、帝后党争与君国分离的政治体验

与“君国一体”中的古代朋党相争不同,晚清“帝后党争”呈现出一种“君国分离”的态势。在这场“后强帝弱”的政治纷争中,文廷式曾出入宫廷,伴帝左右,可谓帝党中坚,后被革遭缉,以后党仇敌之身奔命江湖。于是,既不同于传统文学家在朋党之争中始终满怀君国之忧的抒写,也有别于同时代多数词家处于“帝后党争”边缘的泛泛的人生感慨,身处政治漩涡的文廷式在词中频繁谱写“君国分离”这个属于近代中国政治的特殊体验。可以说,他在对清廷态度极为复杂,既以深厚情谊体察他与光绪帝等政治同盟关系,内敛着对光绪居君位而难以御其国的同情;又时常以仇敌之情“诋慈禧为淫狐再世”,^[21]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实御朝廷的“后党”。于是,在对清廷恩怨缠夹的政治体验中,文氏的政论词在“敛才就范”中流溢着一种“悲悯若揭”的艺术魅力。

政治斗争的一大表现,即是人事关系的调整与变动。文氏早年曾客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1853-1912,字伯愚)交谊甚厚。中日甲午战事起,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上疏画战守策,累万言。虑陪都警,自请募勇设防,称旨。命赴热河练兵,未逾月,以其妹瑾、珍二妃贬贵人,降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释兵柄”(《清史稿》卷四七〇《志锐传》),时为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七。志锐出都前,文氏作《八声甘州》词云:

响惊飙、越甲动边声，烽火彻甘泉。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一枕瞢腾短梦，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阙，凄断哀弦。看居庸关外，依旧草连天。更回首、淡烟乔木，问神州、今日是何年。还堪慰、男儿四十，不算华颠。

志锐此次职务变更，看似受到瑾、珍二妃贬为贵人事件的牵连，实则缘于清廷主战、主和派，以及帝党、后党集团的政治斗争。因此，“盖伯愚此行虽之官，犹迁谪也……此等词略同杜陵诗史，关系当时朝局，非寻常投赠之作可同日语”。^[22]胡先骕曾将文廷式、王鹏运的同作相较，指出“二人人生观悲乐之不同”，“在文以为可乐者，在王则以为可忧”。^[23]此论显然是为了比较而比较，以曲解文廷式词为代价，而达到突出“半塘词大致以凄悲为骨”的目的。文氏填词善用隐语影射讥讽朝局，此词开篇以“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说苑》）、汉文帝时匈奴犯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史记·匈奴列传》）等，刻画日军来犯、清军失利的战争气氛。接着，以诸葛亮等人为喻，铺陈志锐用兵之能及其为国分忧的凌云壮志。可是，此时在中日之战更需要“安东道”的时局中，志锐却被调任“安西道”戍边。清廷用人如“乱点鸳鸯谱”，既不合时宜，又是一种“大材小用”，词人的愤懑、不解尽在这讽刺之笔中。“更回首”数句既是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叹，又是对是非颠倒、忠奸混淆的朝局发出的严厉质问。由此，志锐的“欣然”“坐啸清边”，实则是一种无奈的苦笑，一种自我调侃罢了。故而笔者以为，王澐手批《云起轩词钞》评此阙曰“后片豪宕而神色愈凄”，可谓一语中的。当然，此阙毕竟是赠别之作，故歇拍依然以宽慰口吻结束，从整首词的暗讽基调说，倒正如吴世昌说的“收得乏力”。^[24]

除了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主张“写其胸臆”的文氏自然更喜欢刻画自己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抒写自己的政治体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文氏主战反和，屡上折进言，谋划制敌要策，甚至“揭参首辅，语尤激励”（《昭萍志略·人物志》）。由是，在李鸿章等人欲中以奇祸的背景下，文氏乞假南归，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将出都前，填《虞美人》云：

无情潮水声呜咽，夜夜鹃啼血。几番芳讯问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墙花。衰兰送客咸阳道，休讶归期早。铜沟涨腻出宫墙，海便成田、容易莫栽桑。

此阙“情怀悲郁深沉，愤慨之意内敛而意象凄怆，是所谓‘敛才就范’之篇”。^[25]一则，将个人政治命运置于社稷存亡感怀之中。开头由甲午战败说起，奠定了全篇悲慨基调，那原本无情的潮水此时呜咽之声不息，那原本悲切的杜鹃此时更是夜夜哀啼，“几番”三句以沉郁悲愤的语气诉说台湾被割于倭下等事，痛斥主和派的妥协。二则，内敛着愤懑哀怨之情，以“水”意象贯穿全篇，强化了天道衰变的流失之感。上片以“无情”修饰“潮水”，揭示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这个“弹丸小国”战胜结束，令无数麻木国人之为之醒悟，此“潮水”虽“无情”却有深情；下片化用杜牧《阿房宫赋》“渭流涨腻，弃脂水也”句，以“浊水”比喻后党及

主和派,以爱憎分明的政治情感尽情谱写着对清廷君国分离之政局的无望之思。

文氏词多涉政事,除上述以情动人之作,还表现为直接议论时政,试图以理服人的政论词。如,中日战事起,朝廷围绕是否迁都,争论不休。对此,文氏在当时“战既不足恃,和更不宜言”的局势中,认为惟有“不顾恋京师,则倭人无所挟制”,故迁都才是“预备持久以敌敌之法”。^[26]为此,他又举唐明皇例,且填《广谪仙怨》词云:

玄菟千里烽烟,铁骑纵横柳边。玉帐牙旗逶迤,燕南赵北骚然。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早避渔阳鼙鼓,后人休笑开天。

天宝年间安禄山叛乱,唐明皇仓皇西行,于骆谷吹长笛而成《谪仙怨》曲。后来刘禹锡填词,因未知制曲本事,盖以“谪仙”自况,述其遭谪之“怨”;窦弘余则“广”刘氏未知者,填词“以贵妃为怀”,成《广谪仙怨》调;康骥继而补以“思贤之意”^[27]……至文廷式则认为古代君王“屡迁而存”,实为今之明鉴,更“广”窦、康之意。可见,这是一首铺陈时事,直刺当政的典型政论词。上片写“外患”,倭人入侵,中朝边境(“玄菟”)烽烟弥漫,已由平壤渐迫辽东(“柳边”),或因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逃之夭夭,或因李鸿章辈保船避战,致使日军快速占据旅顺、大连,肆意掳掠(“燕南赵北骚然”)。下片写“内忧”,直接痛斥相臣李鸿章之流只求自保行为,讥讽权贵们畏敌如惊弓之鸟的投降心理,提出清廷早定迁都避寇之计。不过,关于文氏为唐明皇西行正名,以及为清廷“迁都避寇”的建议,研究者多有非议。其实,据叶恭绰说,文氏此词初稿有“盖所失在蓄逆臣,所得在知事变也”二语,认为文氏“意主迁都”,其要义在词序中“灵武勤王”之上。^[28]笔者也注意到,文氏在《闻尘偶记》中提出“迁避”建议后说:在“后党”长期控制的清廷,“乃一误再误,终于不可收拾者,将骄而惰,士窳而残,官府疑忌,天水违行,宁使敌人得志,而不使上得行其志者,其成谋固结,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9]可以说,鉴于“有国而无君”“有君而无势”的时局,以及“后强帝弱”的政治体验,诋毁乃至弃置“后党”而不顾,拥戴乃至为“帝党”勤王而献身,已成为文廷式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思维。由此,方能深入体会这首《广谪仙怨》词序所说的“灵武之众,焉得嗣君?勤王之师,孰为标目”的真正意图。这就是“以明皇喻慈禧,以肃宗比光绪,其意盖欲慈禧西幸,而由光绪总督天下兵马,抗击胆敢入寇之日军”,^[30]足见文氏的政治倾向。

然而,文氏终因得罪“后党”而被罢黜。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御史杨崇伊弹劾文氏,以其“遇事生风”,“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语多狂妄”等罪名,“著即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31]九月,文氏撰《罗霄山人醉语》,有感革职驱逐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国家无道之时,不独不能任贤臣,必思所以除之。其除之之术,或示意于言官,或指目为朋党,诬其名节而不使之辩,坐以罪状而不明其故,实则巧用其诬陷之术而已。”^[32]其实,文氏“革职驱逐一事,实为戊戌政变之先声,当时帝后齟齬中一大公案也”。^[33]革职后,文氏依旧鼓吹变法,赞成光绪帝新政,故一直处于遭清廷缉捕的境遇,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亦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如《鹧鸪天·赠友》词:

万感中年不自由，角声吹彻“古梁州”。荒苔满地成秋苑，细雨轻寒闭小楼。诗漫与，酒新篘。醉来世事一浮沤。凭君莫过荆高市，滹水无情也解愁。

此词因戊戌政变的恐怖气氛而作，是一篇“神似稼轩”的名作，以致以酷评著称的吴世昌也说“此首颇佳”。^[34]上片虚实结合，虚者为角声吹彻、风雨飘摇、凄凉悲壮的时势氛围；实者指戊戌六君子被杀，而自己亦处在“密饬访拿，押解来京”的逆境中。于是，在词人的想象中，社稷已成秋苑，自己亦像李煜那样沦为楼中“囚徒”。下片说自己心灰意冷，只能在醉意中品尝人生的虚无，于是忠告朋友不要效仿荆轲、高渐离，去做无谓的牺牲，因为那些掀起政变的权贵们更为恐怖！可见，文氏所言既是痛极之伤语，又是愤极之反语，而这种爱憎之情正缘自帝、后齟齬的政治斗争。对此，黄浚在《珍妃之死》中说：“予又闻某公言：当时前之松禅、道希以及后之长素、任公等，皆明知德宗必无幸，欲竭天下豪杰力，一与那拉氏搏耳，非不知不敌，乃知其不可而为之。”^[35]至此，文氏身处“君国分离”之境，而心祈“君国一体”之实，以此情感入词，在看似传统的情感抒写风格中，实则渗透着“帝党”与“后党”的斗争、新旧派的对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冲突，从而拓展了词的境界。

四、易代之际背景下清狂逐臣的江湖之思

在中国古代士子的精神世界中，政治生活占据着重要位置。范仲淹《岳阳楼记》有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魏阙是政治空间，江湖、山林亦是。历经“达”“穷”，身系政局的文廷式在“五千年未遇之变局”、即将易代的大势中，更是以一己之感受诠释了政治生活之于个体生命的影响。不过，从“穷”的层面说，既有别于屈原“忠而被谤”，放逐之后，行吟泽畔、投江而卒的绝望，杜甫于颠沛流离中心存儒家仁爱的沉郁，苏轼宠辱不惊的旷达，明清以后部分士人“恐皇舆之败绩”这个高度责任感的略显淡漠，^[36]也不同于后来清朝遗老们念念不忘旧朝的哀怨……文廷式因其兀傲、自负的个性特点，“恒虑清祚之不永”的时局判断，以及在“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37]这个极富近代精神的学术视野，与其在“庙堂”之虑中展现的刚直、坚贞品质相一致，他的“江湖”之思及其营造的词境，虽也缠夹着传统文人的怨怒愤慨之情，但更彰显着清流派人物的清狂色彩，以及近代士子希望跳出“窘若囚拘者”的觉醒意识。

文氏的江湖心，源自其秉性及时局之思。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文氏由京师南下，当他见到“连日所行之境，绿杨万树，红蓼丛生，愈繁密处，愈觉萧疏，乃知天地间自有此种清瑟之物”，坦言“余本野性，对此辄有江湖之思”，并微吟二句云“每当获苇萧森处，便有江湖浩荡心”。可见，与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隐居田园的风流不同，也与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体验禅意的寂静有别，文廷式是在“愈繁密处，愈觉萧疏”处滋生退处江湖的心愿。这既是基于“盖深知世变之巨，将来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的时局判断的结果，

也是鉴于“自维薄植,谨当力守‘难进易退’四字,庶可保其弩拙”,对政治斗争复杂性、残酷性早有预见的结果。^[38]

文氏词多言江湖之思,与其平生经历也有关系。就其活动轨迹而言,除了青少年时期生长于广东,其后主要以京城为轴心,奔波于湖湘、岭南、沪宁,一度曾亡命日本。无论是前期以走进京城为目的的求仕之旅,还是后期被迫走出京师的逐臣之途,文氏词中总有一种浓郁的“人在旅途”之慨,这从他数量众多的羁旅词中可以得到深刻的认识。就求仕之旅而言,据钱仲联《文廷式年谱》载,自同治十二年(1873)初入都应顺天乡试不售,至光绪十六年(1890)中式恩科贡士,直至被光绪帝亲拔第一名,前后入都约九次。在岭南与京师往返中,文氏交友甚众,且因才情而“名动公卿”,但如“十年踪迹,泛梗浮槎,靡知所届”^[39]的羁旅之慨、人生之叹时见笔端。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二日(3月14日)午夜,文氏由京到沪,寓洋泾桥泰安栈,得《桂殿秋》词一首^[40]:“吹玉笛,过江干。十分春思已阑珊。晓风残月无多地,便作天涯柳絮看。”如果说入朝为官前的文氏多自喻“柳絮”“泛梗浮槎”,以状谋生求仕的漂泊感以及无力掌控命运的无奈感,那么入朝后的文氏江湖之思便逐渐增加“难进易退”的仕宦体验。这较之传统词家,词境有所拓展。光绪十八年(1892)秋日,文氏居京师粉子胡同,作《水调歌头·病中戏答友人》词。此阕风格极似稼轩,喜用儒佛道学说抒写生命感喟,采用散文笔法自由铺陈,但与稼轩词的豪气似有不同,像“卿用卿家法,我与我周旋。胸中一事无碍,便算小游仙”,“倦即曲肱卧,火宅已生莲”,文氏则在病中愤懑情绪下彰显着自己的“清狂”特点。此时文氏身处“庙堂”而直言归隐,那么离开“庙堂”又将如何?试读《八归·乙未四月,答沈子培荆部见赠之作》一阕:

洪流带郭,平芜纤轡,南陌乍染浓碧。斜阳浅暝城闾处,犹认乱鸦催暝,飞燕愁夕。葵麦参差春色老,好料理、江湖归楫。恰难忘、载酒经过,寂寞子云宅。谁信苍梧路阻?凭将心事,唤醒西京铜狄。罾蛟潭底,拜鹃林下,此意无人知得。向东风捣麝,吹起香尘遍今昔。铃声紧、别愁如海,旷野星稀,苍凉歌主客。

词人寄调“八归”,显然取“归”字以寓自己被迫“乞假归乡”之意。胡先骕曾评此词曰:“眷怀君国之思,溢于言表。”^[41]表面来看,的确如此。那如长带一般环绕城郭的溪流,那在平原旷野中的回车举动,那回望的斜阳浅照、众鸟归巢的京都城门之景……无不喻示着词人面对“庙堂”欲去仍留的沉郁之思。然而细读后,便可知文氏借“苍梧路阻”诉说“求君”之难,以深渊蛟龙、拜鹃林下袒露自己那无人能识的凌云壮志,以及以麝尘自喻忠君报国之香依旧……均蕴涵着词人在帝后党争中那独特的君国分离的政治体验。于是,此阕在对社稷之思的一片赤诚中,又陈说着对此次被迫离京的不满。这既非传统文士的怨而思变,也非清末革命派的怒而无怨,而是一种恨及而怨、既怨且怒的缠夹情怀。如此,我们便能深刻领会文氏词那“敛才就范”“悲悯若揭”的艺术风格。

正因文氏身系君国分离之朝局,而又坚信“君国一体”之信念,随着由“庙

堂”到“江湖”政治命运的真正转变,身为逐臣的牢落江湖之慨,几成后期词最频繁的主题。如,《贺新郎·赠黄公度观察》(1895)云“平生尽有青松约。好布被、横担榔栗,万山行脚”,《贺新郎·丙戌都中与汪莘莘伯联句之作》(1896)云“况岁晚、江湖潦倒”,《春光好·新年》(1897)云“休忆壶瀛旧事,且将诗酒随缘。家计无多生愿足,五湖船”,《点绛唇·戊戌重九作,是日霜降》之二(1898)云“莫道飘零,好是斜阳暮。扁舟去,芦中人语,回首江亭路”,《念奴娇·旅思》(1900)云“因念久客天涯,端居多感,萧瑟青芜国”,《贺新郎·赠梁节庵》(1901)云“谁道神州陆沉后,还向江湖重见”,等等。兹读其《翠楼吟·岁暮江湖,百忧如捣,感时抚己,写之以声》一首:

石马沉烟,银兔蔽海,击残哀筑谁和? 旗亭沽酒处,看大扁、风樯轲峨。元龙高卧。便冷眼丹青,难忘青琐。真无那。冷灰寒柝,笑谈江左。一筇。能下聊城,算不如呵手,试拈梅朵。茗鴣栖未稳,更休说、山居清课。沉吟今我。只拂剑星寒,款瓶花妥。清辉堕、望穷烟浦,数星渔火。

叶恭绰云“此感德人占胶澳事。原稿注:丁酉作”。^[42]光绪丁酉年(1897),文氏在上海。全词依“感时、抚己”模式构思,乍读之,文氏多借中国历史典故抒情达意,与传统伤时忧生的诗词境界无异,然细读之,文氏所抒情思显然有别。一则表现在刻画的时代环境的不同,无论是“石马”句回忆中日甲午海战局势,还是“旗亭”句刻画德占胶澳之情形,词人着力抒写的是外敌入侵时局中的情思感受。二则表现为个人的政治心态的变化,上片先以荆轲能击残哀筑为喻,表明之前身在庙堂而徒感知音甚少,后以三国陈登为喻,表明如今身为逐臣,只能躲避海滨,冷眼看天,于孤寂凄凉中自我解嘲;下片以射书救聊城的鲁仲连为喻,虽胸怀退敌之策,但既因身在江湖又处于被清廷缉捕之境,恰似栖宿茗草的鴣鸟而无安宁之日,故只能“沉吟今我”,拂剑叹息,与瓶花为伴,望洋兴叹。由此,词人在伤感德人占胶澳之时势背景下,抒写“抚己”之悲,尽显江湖之思,在“我对朝廷”“朝廷对我”双向构思中,“一路写来,每转愈深”。^[43]这已不是范仲淹所谓“是进亦忧,退亦忧”所能包涵的情思形式,而是在呈现自己“百忧如捣”的政治心态之中,暗藏着由身为逐臣到心为弃臣的心态之变。在一定层面上,“写其胸臆”的文氏通过抒写自己的经历与体验,拓展了词家之境界。故叶恭绰评此阕云“气象颖异,强村所谓‘兀傲固难双’也”,可谓知言!

五、词的诗化与近代词学的时代共感

可以说,中国传统词学发展史在“词不同乎诗而后佳,然词不离乎诗方能雅”^[44]的基本精神下,经历了自诗观词,以雅为目;诗词互观,以雅为尚;自词观诗,以雅为本等三个逻辑阶段。^[45]这既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自然选择,也是尊词观念独特性的反映。因此,词的诗化现象在加速词之个性灭亡步伐的同时,又在词的唱法失传之后,为词学赢得了某种发展空间。不过,时至近代,因为“诗界”等诸多领域畅言“革命”而未见“词界革命”的呼声,致使部分学者将责任归

咎到词的诗化上。他们认为“近代正是儒学诗教崩坏的时代,以诗教作为词旨,无疑使词更快地走向衰微。词已成为古典格律诗的一部分,诗化成了词衰微的主要原因”。〔46〕此论因过于侧重于中国社会“可能走向”的主流层面,而误解近代词学的部分特征,兹分解如下:

中国近代是在新知与旧学交织中,由旧趋新的时代。说这“正是儒学诗教崩坏的时代”,与历史并不吻合。其实,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的社会刺激了士人们深藏心底的传统忧患意识,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得以重振;同光新政时期,在传统文士的心中,平复太平军无疑是儒学之于异教的胜利,于是儒学复归成为学者的时代要求,“以为汉学宋学都包含‘以儒术治天下’的所谓微言大义”;〔47〕清末民初的易代氛围,又唤起了部分旧知识分子“重振风雅、再整名教”的愿望,一批“钻故纸堆”的学者亲自参与词学研究活动,更是直接推动了词学复古思潮。于是,在此“旧学”延续中,我们读到了如刘熙载“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也”“中正为雅,多哇为郑”〔48〕之论,陈廷焯“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49〕的沉郁顿挫主张,以及谭献“折中柔厚”、王鹏运与况周颐“重拙大”等以儒学诗教为灵魂的词论。而这些近代词学最核心的主张,正是对近代学术思潮的一种呼应。

上述充实着儒家诗教思想的近代词论,因与“西学东渐”背景下近代中国时代新思潮相左,固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词体的革新,但因此而认为这是导致“词衰微”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又与近代词坛兴盛的局面(包括词学、词的创作)不合。一方面,词的诗化虽以诗教化为主,但并不等于诗教化;另一方面,即便儒学诗教思想也不能说就难以呼应近代社会变革心理。旧体诗歌阵营所以可以显豁地提倡“诗界革命”,是因为时至近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它们在追求诗歌趣味的同时,业已完成了经学化(汉代儒家说诗)、历史化(如唐代杜甫诗)、学问化(宋诗)等“经典化”阐释的过程,而词的诗化之后,上述现象至近代仍旧有着未尽的发展空间。近代词家也正是在对词的经学化、历史化、学问化等“诗化”进程中,以改造词体的方式呼应着近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当然,这似乎并非因西学等外在原因带来的“革命”,但设身处地为近代词家着想,以诗衡词,或许限制了词的“革命”,但更是拓展了词的变革之路,为词找到了生存的机会、理论建树的空间。因为在近代词家看来,只要能言志抒情,以词记录社会变迁,呈现其对社会的关切用心,始终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文体形式的新旧与否并非革新的首要对象。可以说,这正是如由张惠言主张比兴论词所强化的词的经学化、学问化走向,周济提出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词的历史化走向等,之所以成为近代词坛的主流风尚的突出原因。

由此,方能真正领会梁启超从“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方面反思“诗界革命”的意图。需要说明的是,在“诗界革命”问题中,有学者提出过“词体是缺席却又是在场的”〔50〕的观点。其实,如梁启超《释革》一文曾完整提及到“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

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51]惟独未直言“词界革命”，既可能与近代词的诗化现象突出有关，也与他“要把‘诗’字广义的概念回复转来”的主张有关，因为词已在“诗界”中。当然，后者的明确主张出自梁启超1920年所撰《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解》一文，以此为据解析其早年“诗界革命”的“诗”的概念，确实存在“执后以律前”之嫌，但《饮冰室诗话》内含10余则论词之语，且部分从“诗界革命”角度诠释，又如何解释呢？尤其是他在“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的主张下，历数中国合乐之文，指出“宋之词，元之曲，又其显而易见者也”。进而，又痛斥因“诗与乐分”，“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的现象，提出曲界革命的要求。^[52]故多年前，笔者认为梁启超所说的“诗界革命”抑或更准确地说“曲界革命”理当包括词体在内，^[53]至少并未排斥词体。

以此观照文廷式词，相较于前文所说的词的诗化诸多现象，他在“写其胸臆”这个彰显近代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填词原则指导下，以近代最具显示度的政治情感为轴心，既在中西文化碰撞、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土的背景下，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以自己政治活动经历为基础，揭示君国分离的光绪朝政局形势，抒写维新人士“君国一体”的政治理念；通过对“帝后党争”、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政治纷争等的刻画，抒写自己爱憎分明的政治情感，表现出由旧趋新的政治态度，乃至由身为逐臣到心为弃臣的政治心态的变化痕迹，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精神”。当然，面对近现代诸多文学革命口号，多以大众化为导向，着力于语言形式、语体风格等方面的革新，像近代词“诗化”走向中越来越浓的文言化、学者化等现象，似乎仍关注于精英层面，而与大众化渐行渐远。由此，诸如“自写胸臆”的词论主张，从词作者心中期待的读者群体来说，似乎仍是精英层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精英阶层的觉醒正是中国近代意识的典型特征。因此，尽管文氏未曾提出“词界革命”口号，甚至还反对新派诗以新语言入诗的做法，但文氏这种“以旧格调蕴新理想”的创作特点，本身就是近代词家拓展词境的有力证据，也是近代词在“诗界革命”中“在场”的有力说明。或许正因如此，施蛰存先生将文氏词视为近代词的开端。

注释：

[1][53] 杨柏岭：《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学术界》2004年第1期。

[2] 谢冕：《近代文学浅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1-3页。

[3]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9页。

[4][52]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1、48页。

[5] 叶恭绰：《全清词钞序》，《全清词钞》，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 施蛰存：《历史的“近代”和文学的“近代”》，《北山四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7][32][42]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4、823-824、1427页。

- [8] 杨柏岭:《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308-315页。
- [9] 钱仲联:《文廷式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第302页。
- [10][12]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重修增刻本。
- [11][13][15][16][17][18][19] 文廷式:《罗霄山人醉语》,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09、827、827、829、815、815、828页。
- [14][20] 叶恭綽:《云起轩词评校补编》,龙榆生校录,《同声月刊》1943年第1期。
- [21] 转引自《文廷式笔记》,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
- [22] 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
- [23] 胡先骕:《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 [24][34] 吴世昌:《词林新话》(增订本),吴令华辑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80、380页。
- [25] 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
- [26][29] 文廷式:《闻尘偶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48-749、749页。
- [27] 参见窦宏余:《广谪仙怨并序》、康骥:《广谪仙怨并序》,清代彭定求等编:《全唐诗》(8),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488-4489页。
- [28] 龙榆生:《云起轩词评校补编》,《同声月刊》第3卷第1号,第81页。
- [30] 钟振振:《读〈金元明清词选〉札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 [31] 《谕:御史杨崇伊奏词臣不争众望请立予罢黜一折》,参见清代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光绪一百三十二年,清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
- [33][35]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7、131页。
- [36] 李双华:《从“穷而后工”到“隐而后工”——中国古代诗歌由古典到近世的转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471-476页。
- [37] 沈曾植:《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君芸阁墓表》,《同声月刊》1943年第2卷第12期,第147-148页。
- [38] 文廷式:《南轺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45页。
- [39] 文廷式:《旋乡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03页。
- [40] 文廷式:《湘行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17-1118页。
- [41] 胡先骕:《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
- [43] 陈邦炎:《论云起轩词》(《临浦楼论诗词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4页。
- [44] 查礼:《铜鼓书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2页。
- [45] 杨柏岭:《词的雅化与尊词观念的演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550-555页。
- [46] 陈铭:《诗化:近代词衰微的基本原因》,《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 [47]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 [48] 刘熙载:《艺概》卷四,《刘熙载集》,刘立人、陈文和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 [49]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九,《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686页。
- [50] 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3-372页。
- [5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页。

[责任编辑:黎虹]